

政治解放的不可逾越性 及其当代价值

杨晓东

(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哲学博士)

[摘要]马克思政治哲学对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超越主要地就表现为创造性地提出人类解放的政治构想。然而, 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不经过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解放, 人类解放的远大构想就难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在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 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经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因此, 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马克思所述说的政治解放, 彻底解决好宗教信仰问题、人权问题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 政治解放; 人类解放; 不可逾越性; 政治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7462(2008) 04- 0005- 05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既是对欧洲近代政治理念的根本性超越, 也是他的政治哲学形成的根本标志。毫无疑问, 人类解放相对于政治解放来说是一种超越: 一方面, 近代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政治解放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 另一方面, 马克思本人所代表的社会底层的利益也促使他思考如何将解放不断推进。因此, 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推进以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人类解放运动便成为进一步革命的主要内容。^{[1]343-344}在这个意义上, 政治解放似乎是已经丧失存在的合理性, 人类解放已然成为替代政治解放的新事物, 甚而被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和目标。并且, 在学界关注最多的也是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 而将政治解放理论视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弃置一边。

事实上, 如果我们回顾 20 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就会发现,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错位: 马克思所言的人类解放是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基础上发生的, 而 20 世纪那些旨在实现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国家, 却无一经历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解放, 就如

同它们无一经历了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一样。并且, 在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所谓人类解放均没有真正结束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的历史, 而是以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式重新复活了专制制度和专制权力的统治, 甚至将其发展到极致。而且更令人费解的是, 这种专制权力的统治又都是在人类解放的旗帜下不断扩张的。这种反常的现象不能不引发我们深刻的反思: 政治解放是否真的已成为历史? 能否逾越政治解放而径直进入人类解放的发展阶段? 毫无疑问,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将会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

在马克思那里, 政治解放意指近代资产阶级反对神权和封建专制的革命, 所获得的成果是政治摆脱宗教的束缚、市民社会消除了政治性而独立发展以及人民不再按照等级出身而平等独立地参与政治。这些成果相对于封建专制下的神权——政治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马克思之所以提出人类解放的构想, 乃是源于他洞

察到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他把人类解放看作是理想社会的实现,因为只有通过人类解放才能消除矛盾和异化现象,达至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普遍的自由和平等。但是,能否直接超越政治解放而进入人类解放的理想阶段呢?马克思曾以在革命上落后于英、法的德国为例提出这样的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一个 *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现有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即将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2]460}对此,他并未做出明确的答复。或许有人会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事实证明“卡夫丁峡谷”是可以跨越的。但是,经验同样可以证明,这些国家所谓的人类解放真的就与马克思的构想毫无二致吗?

毋庸讳言,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因为它科学地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社会进步的历史前提、客观条件、内在矛盾和规律,确认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以人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现实基础的,是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推动下的一个有着自身的客观性、规律性的过程,并由此推论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趋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声称:“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3]101-102}并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101}虽然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论述政治形态的发展,但我们根据上面的基本原理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经济的社会形态”本身必然包括与经济形态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形态。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形态必然要与经济形态相适应,那么它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合乎规律的、不可取消、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就最终实现人类解放而言,如何看待这个不可取消、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呢?

马克思认为,人类解放的最终实现必须依赖于政治解放所产生的物质条件。他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线索,把社会形态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

被称之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4]104}。这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解放的阶段,或共产主义阶段。在马克思看来,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才能通过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现代社会正是随着商业、货币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第三阶段的产生也必须以第二个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阶段为前提,即“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108-109}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也就是他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所说的,以普遍交换手段为特征的、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生活;而“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就是指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就意味着,人类解放只能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发生,因为第三个阶段依赖于第二个阶段为其所创造条件。由此可以推论,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只能建立起政治解放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形态,因而人类解放也必然在政治解放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二

既然政治解放意味着人们获得抽象的、形式的解放,是一大进步,那么人类解放就必然不是对政治解放的抽象否定和排斥,相反,应该依赖于政治解放所提供的必要前提。因为“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2]442},从而也就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制度。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就是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是那种“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展程度与之

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4]110} 这种人的依赖关系,使人民生活的组织形式如领主、等级、行帮、行会等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并通过人民生活对这些组织形式的依附而在国家权力与人民之间普遍地建立起统治者与仆从的关系。因此,在这种狭隘的社会关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4]485}。

事实上,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总是与不发达的交换手段密切相关,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产物。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4]104}。这同时也表明,真正能够摧毁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的社会力量,只能是交换手段发达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本身。因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市民社会的成员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个人,也就是把个人从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从而也就是从政治共同体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市场主体,其经济行为必然排斥任何专制权力的干预,因为“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5]394}。由此可见,政治解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旨在追求政治解放的政治革命就是市民社会的革命,“它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并“摧毁了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从而“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2]441}。

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笼统地将市民社会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虽然马克思的德文原著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词常常是指“资产阶级社会”,但是,马克思之所以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资产阶级社会,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最典型的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的所有内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6]实际上,“市民社会”是一个

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一般性概念,借用托马斯·潘恩的说法,市民社会是各个个人根据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自愿结成的社会经济联合,它用积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利益;政治国家则是人们为了避免社会的邪恶和混乱而不得不建立的组织形式,它用消极的方式增进人类的福利。而‘资产阶级社会’则是一个具体的概念,指的是近代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更进一步说,只要政治国家存在,那么就必然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曾屡屡出现诸如“中世纪的市民社会”、“旧日的市民社会”、“先前的市民社会”等提法,因此这个市民社会却未必一定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前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实际上是重合的,其典型表现就是政治上的等级也是经济上的等级,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不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内在关系。可以确定的是,只是在近代政治解放的目标下,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界限才有了明确的区分,并且对于推动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只有作为市民社会革命的政治解放才能真正结束专制权力或专制统治的历史,因此,政治解放就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摆脱政治约束创建政治条件。“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7]313}。虽然表面上摧毁专制制度往往需要体现社会要求的外部革命力量,但是专制权力和专制制度的彻底消除则必须依赖于市民社会的高度发达,让交换手段充分发达的经济形态取代专制政治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或世俗基础,也就是消除和改变专制统治赖以生存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乃至社会大众的心理结构。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人类解放都不可能在专制权力的统治中实现。“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2]283-284}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乃是市民社会充分发展的产物。因此,“没有经历市场经济完整发展的社会,就不可能经历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解放,而没有经历完整意义上政治解放,就不可能真正结束专制权力的统治,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

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9]从根本上说,拒斥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拒绝了根除专制政治的唯一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主观上怎样把人类解放作为终极的政治目标,并从人类解放的意义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但事实上这种没有经历政治解放的所谓人类解放却潜在着以人民的名义复活专制权力的危险。

三

确认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这对于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市场经济通常也被称为“自由经济”,这种经济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就是在社会中存在一个相当大的自由活动空间,而这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置身于当代中国社会的语境中来思考政治解放的时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以家族和宗法等级伦理为本位,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起步很晚,至今真正的法权人格和道德实践主体都没有确立起来,更谈不上个人权利的界定与维护。所以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启蒙的使命不但没有完成,而且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人们更应该重视对西方近代政治价值的批判性借鉴和个人权利的张扬。惟有如此,民主政治建设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一度照搬苏联的发展模式,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在反思自身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意味着我国社会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开始。总体说来,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起步时期起,就围绕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这条主线不断延展,经历了十余年的摸索,直到90年代初终于确认市场经济是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明确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样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目标。不可否认,为了积极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我们党和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目标下确实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并且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极富有启发性和想象力

的政治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但是,由于对某些问题缺乏应有的识见甚至难以割舍的偏见,就使得“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依然是相当模糊的。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正在改变我国政治发展的世俗基础,并且正在逐步明确要求与之相符合的政治体制。因此,“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社会形态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作为市民社会革命的政治解放就必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10]问题只在于我们如何从理论上去把握这个过程的性质和趋势。为此,依据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我们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提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推进并完成马克思所阐释的“政治解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就此而言,必须在政治解放的意义上重新理解民主政治的准确内涵,确认现代民主政治形式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不经过必要的政治解放,我们事实上就不可能切实获得关于民主政治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也不可能真正认识现代民主政治形式的内涵和意义,从而有可能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改头换面地向专制政治复归。无论如何,我们所希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能直接从封建主义的政治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尽管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是我们政治建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以生长的直接土壤。

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最重要之点就是必须承认不能跨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特定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11]^[164]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克服传统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就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既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无法跨越必要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阶段,那么,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亦应从政治解放的内涵当中汲取有益

的成果。

如果说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马克思所述说的政治解放,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宗教问题、人权问题、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所要解决主要问题。这就是说,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都必须完成三大任务:其一,必须把国家从任何一种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领域的事情,并完整地确认社会成员信仰自由的权利。其二,必须明确地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私人财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确认公民自由地使用和处置私人财产的权利。其三,必须明确国家和政府的最基本功能就是要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使公民的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利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并通过一定的民主形式在政治上体现出来。^[4]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而且也只有通过政治解放才能真正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矛盾和问题。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重视政治解放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将其作为政治文明建设的终极目标,更不是对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的否定。马克思在其政治哲学中通过事实论证为人们追求人类解放指出了一条现实的路径,而政治解放就是这其中的必经的一个阶段。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以人类解放作为终极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考虑到政治解放在历史发展中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当然不能滞留在政治解放的发展阶段上,因为政治解放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矛盾性迟早会推动我们朝着人类解放

的崇高目标奋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能够使政治解放向人类解放的过渡更加自觉,而不能无视历史现状想当然地创建虚幻的空中楼阁,我们已经有过这方面令人痛心的教训。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不经过完整意义上的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远大构想就难以实现,脱离政治解放空谈“人类解放”无异于自欺欺人。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3]因此可以说,政治解放的全部努力,就在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亦即完善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惟有在此基础上,人类解放的条件才能够被创造出来。

参考文献:

- [1]杨晓东. 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6]俞可平.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J]. 中国社会科学, 1993(3).
 -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阎孟伟. 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 教学与研究, 2006(12).
 - [9]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责任编辑: 刘锡桓)

